

近朱者赤：邻里环境与学生学习成绩

王军鹏 张克中 鲁元平*

摘 要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本文在居住隔离的背景下考察了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良好的邻里环境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其中的榜样人群为学生树立了典范, 激励学生和家长提高教育期望,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学习过程中, 而且优势家庭中的学生会受到更大的影响。不过, 公共教育资源投入的增加可以减轻邻里环境带来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制定相关干预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居住隔离, 邻里环境, 学习成绩

DOI: 10.13821/j.cnki.ceq.2020.01.07

一、引 言

居住空间是个人同其他人在经济、社会等维度建立联系的重要渠道, 社区是社会互动最为频繁发生和知识溢出最为密集的空间范围。社区内的邻里环境塑造了人们日常所接触的同辈群体 (peer group) 和社会网络, 来自多国的经验证据显示邻里环境会显著影响个体教育、收入、就业、创新等多种社会经济活动 (Nicodemo and Garcia, 2015; Chetty and Hendren, 2018a; Bell *et al.*, 2017)。与物质资源相比, 邻里环境属于非物质维度, 无法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政策实现在人群之间的重新配置, 它们对个人发展可能会产生更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居住在落后社区 (disadvantaged neighborhood) 的家庭更有可能陷入贫困代际传递的陷阱之中, 由地理空间因素所导致的不平等问题不容忽视 (Chetty *et al.*, 2016a)。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间, 中国的城镇化率由 1978 年的 17.9% 上升到 2016 年的 57.35%, 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此期间实现了居住空间上的再生产和居住空间权力的再分配。市场化的房价形成机制使得优势阶层可以通过价格竞争手段“择优而居”, 而以低技能人员和流动人口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则形成

* 王军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张克中,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鲁元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 张克中, 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560, 430074; 电话: 13971208257; E-mail: zkzdr@hust.edu.cn。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感谢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567 Seminar 成员的建议, 使得文章质量有很大提高。当然, 文责自负。

了贫困集聚地带, 引起了居住隔离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问题 (陈钊等, 2012; Monkkonen *et al.*, 2017)。居住隔离在地理空间上将不同的阶层分开, 产生了阶层的空间异质性分布, 降低了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互动的频率, 不利于提高落后社区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产出水平, 而且居住隔离在代际之间具有明显的传递性, 会导致社会流动性的下降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Culter and Glaeser, 1997; Borjas, 1998)。但是, 在目前关于居住空间的经济学研究中, 国内现有文献多是讨论教育市场和住房市场间的互动, 即“学区房”现象, 其本质是研究与社区相依存的硬件资源, 而对社区内部成员之间非市场互动的关注相对不足 (陆铭和张爽, 2007; 郑磊, 2015)。

基于此, 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考察了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的情况下, 良好的邻里环境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榜样效应 (role model effect) 是重要的传导机制, 良好的邻里环境意味着家庭日常所接触到的人群大多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稳定的职业和良好的家庭经济状况, 在教育方面为学生提供了积极、正面的参照和学习榜样。因此, 家长和学生都会提高他们的教育期望,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学习过程中, 家长会更加严格要求学生的作业和在校表现、监督学生的日常作业、增加同任课老师的沟通与交流, 学生的学习态度也得到了改善。

教育是改善阶层流动性的重要渠道,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探究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与教育公平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不同的人群间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良好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促进作用在男孩和年轻群组中显著高于其他群组, 只有本地非流动、具有非农业户口和来自高教育、精英家庭的学生才会受到良好邻里环境对学习成绩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邻里环境因素进一步拉大了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在学习成绩上与来自其他家庭的学生之间的差距, 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将变得更加艰难, 加剧了教育不公平的严重程度。但是, 通过加大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改善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可以减轻邻里环境因素对弱势家庭学生学习成绩造成的不利影响, 有利于他们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和实现阶层向上流动, 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公平性。

目前, 我国在城市发展和社区建设过程中面临严峻的居住隔离问题, 破解“城中村”等典型居住隔离现象所产生的困局、提升弱势人群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改善社会流动性成为当下公共政策研究的重点。在此背景下, 本文对邻里环境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将为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本文在居住隔离背景下探讨了邻里环境的社会经济后果, 将居住隔离、邻里环境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纳入统一分析框架, 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流动和贫困代际传递的形成机制、加深

理论分析深度，也弥补了国内居住隔离、邻里环境相关研究的不足；第二，邻里环境研究的重点是识别传导机制，本文结合实际情境，有效地识别了邻里环境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传导机制——榜样效应假说，排除了社区共同监督假说和硬件资源假说，丰富了邻里环境传导机制的研究；第三，公共教育资源投入的增加可以消除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影响的研究结论对制定公平的教育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本文还从混合居住和期望干预等方面提供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文章后续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邻里环境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梳理其中潜在的传导机制，介绍中国的相关研究；第三部分展示文章使用的数据、模型和变量定义，进行简单的描述分析；第四部分汇报实证结果、验证传导机制，并做进一步的分析；第五部分进行总结和政策讨论。

二、文献综述

教育不仅关系着个人未来的收入，也会影响到社会阶层流动、社会公平和贫困代际传递 (Chetty *et al.*, 2016a; Chetty and Hendren, 2018a)。自1966年的《科尔曼报告》¹发布后，教育领域内的学者们将研究的关注重点从学校教育资源转向家庭、社区等方面。传统观点认为家庭环境对学生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家庭的某些特征可能内生于邻里环境，是邻里环境影响学生发展的潜在机制之一，已有研究可能忽视了邻里环境的重要作用。以Wilson (1987, 1996)的研究为代表，众多学者研究了邻里环境对儿童及青少年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处在以贫困人口为主要居住人群的邻里环境中，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会受到消极影响，而在低贫困率等具有良好邻里环境的社区居住则可以显著改善个体在教育、健康、犯罪行为、劳动力和婚姻市场等方面的表现 (Ainsworth, 2002; Sciandra *et al.*, 2013; Chetty *et al.*, 2016a; Chetty and Hendren, 2018a)。除此之外，学者们近年来在个人创新发明活动、语言使用、金融投资等方面也发现了邻里环境的重要影响，并且将邻里环境影响程度的强弱同地区的其他特征联系起来，探索其中的内在联系 (Bell *et al.*, 2017; Rickford *et al.*, 2015; Pool *et al.*, 2015; Chetty and Hendren, 2018b)。

在邻里环境的相关研究中，美国 Moving to Opportunity (MTO) 是应用

¹ 1964年，美国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教授组织实施了一项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公立学校向少数族裔提供公平教育机会的情况。在对学校资助、学校和教师的质量差异、学生的家庭背景等与教育成果之间关系的讨论中，科尔曼认为造成少数族裔学生学习水平低的原因在于学生家庭和同学间的社会经济背景，他重新界定了教育机会均等的内涵，并于1966年向美国国会递交了名为《教育机会平等》的报告，即《科尔曼报告》。

最为广泛的研究案例。为解决贫困人口聚集带来的社会问题、振兴衰落区域，美国于 1994 年开始在芝加哥、波士顿、纽约、洛杉矶和巴尔的摩等五个城市推行该计划，当居住在高贫困率社区的家庭向低贫困率社区搬迁时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住房补贴。通过将申请家庭随机地分为实验组 (MTO Group)、对比组 (Section 8 Group)²和控制组 (Control Group)，研究者们可以通过准自然实验的方法探索邻里环境对个体和家庭的影响。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从高贫困率社区搬迁至低贫困率社区显著提高了子女成年后上大学的概率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益，有助于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并且邻里环境影响的强弱程度与居住时间呈现线性关系 (Chetty *et al.*, 2016a; Chetty and Hendren, 2018a)。经过测算，MTO 计划为参与者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当于年收入增加 3 477 美元，远远超过良好邻里环境导致的房价上涨幅度。良好的邻里环境能够为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对于改善他们的发展境遇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具有重要意义 (Chetty and Hendren, 2018b)。

在邻里环境与学生发展的研究中，学者们将其中的传导机制大致归纳为榜样效应³ (role model effect)、社区共同监督 (collective supervise) 和硬件资源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榜样效应假说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 Wilson (1987, 1996) 关于美国内城区的研究，Wilson (1987, 1996) 认为由于内城区的居民与主流社会和工作机会之间产生了隔绝，缺少榜样人群的示范引领，因此会导致内城区的青少年处于不利的发展境地。亦有研究显示在以精英职业人群为主要居住人群的社区中，社区内居民的行为举止为家庭中的学生树立起了榜样和参照体系，有利于激发学生在学校追求成功的态度和行动，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预期回报，改善对学校行为规范的遵守情况。与之相反的是，落后社区相对缺少在教育方面可以充当正面榜样的人群，消极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更容易传播扩散，拉大了社区居民与主流社会的距离，对青少年产生了消极影响，降低了他们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Ginther *et al.*, 2000; Oberwittler, 2007; Chetty and Hendren, 2018a)。

竞争性的假说包括社区共同监督假说和硬件资源假说。社区共同监督假说认为落后社区中的成人之间相对缺少信任，削弱了他们在监督、管控社区内青少年行为举止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意味着更少的社区集体活动 (Galster and Santiago, 2010)。社区内的无序和集体效能的缺失是邻里环境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原因。缺少成人的共同监督和社区集体活动，以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次文化获得了滋生的土壤，同辈效应进一步强化了该影响，

² 在 MTO 计划之前，美国通过 Section 8 政策为负担不起房租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

³ 也被称为集体社会化 (collective socialization)。

青少年更容易参与到风险活动中，产生抵触学校正规教育的观念和行为 (Browning *et al.*, 2008; Harding, 2009)。硬件资源假说则认为社区照料中心、幼儿园、学校和休闲娱乐等设施对青少年具有重要影响，尤其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在家庭提供的照料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其影响更为重大 (Wodtke *et al.*, 2011; Christian *et al.*, 2015)。此外，衰败、破旧的社区环境会在心理层面对居民产生影响，增加他们的精神压力和对生活的无助感，进而引发激进行为和犯罪活动 (Wilson and Kelling, 1982; Guerra *et al.*, 2003)。落后社区也更有可能受到水、空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的影响，导致居民预期寿命降低、认知能力下降及出生健康状况不达标 (Chay and Greenstone, 2003; Rosenfeld *et al.*, 2010; Aizer *et al.*, 2018)。

相比国外而言，国内学者对邻里环境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邻里环境对家庭捐赠行为、个体肥胖程度等问题的影响 (晏艳阳等, 2017; 李磊等, 2016)。而在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则主要是基于家庭背景的视角研究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角度进行解释，较少关注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在已有研究中，与本文较为相似的是吴愈晓和黄超 (2016) 对学校阶层分割与学生教育期望之间关系的探讨，他们发现随着学校的平均阶层地位的提高，学生的教育期望会相应提高，而且出现了学校阶层分割的现象，不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三、数据及模型

(一)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所提供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CEPS 基线调查于 2013 年秋季学期和 2014 年春季学期进行，在全国范围内共抽取了 112 所学校和 448 个班级。调查范围涵盖了与教育过程相关的不同层次的基础数据，为考察学生学习动机以及学习成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其中，CEPS 基于学校保存的成绩单，搜集整理了受访学生在 2013—2014 学年秋季学期语文、数学、英语的期中考试成绩。由于不同地区、学校和年级的考试试卷内容、难度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在每个学校的年级层面对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平均成绩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使不同学校和年级之间的成绩具有可比性。

国外研究中对于邻里环境的度量大多是使用家庭所在县区、街区或者是普查区域 (census tract) 中某类人群 (如贫困人口) 的占比。然而由于区域内部可能存在着社会隔离现象且家庭自我感知的社区范围与统计区域并不完全一致，这种度量方式不能准确刻画实际影响到个人和家庭行为的邻里环境。

在中国，人们与周围邻居总体上保持着良好的日常沟通与交流。⁴因此，本文使用 CEPS 家长问卷中父母回答周围主要居住人群的职业类型作为邻里环境的度量。以职业类型作为邻里环境的度量可以避免因自报收入的不准确性而带来的偏误。对邻居职业类型的知晓反映了家庭与邻居之间的互动水平，这是家庭所直接感知、日常接触到的邻里环境和真正会对家庭行为产生实际影响的人群。具体的，本文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教师、医生、工程师和公务员视为精英人群（吴愈晓和黄超，2016）。当受访者回答家庭周围主要居住着精英人群时，本文认为家庭中的学生处于良好的邻里环境之中。

图 1 展示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教师、医生、工程师和公务员等精英职业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从中可以看出，精英人群的受教育水平比其他人群高出将近 30%，家庭经济状况也较为良好。图 2 表明处于不同的邻里环境时，学生标准化的单科和平均成绩会呈现出显著差异。当家庭的邻居从事精英职业时，学生的学习成绩会显著高于其他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教师、医生、工程师和公务员等精英职业人群所拥有的良好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为社区内的学生在教育方面提供了参照、树立了榜样，营造了重视教育的良好氛围，从而激励学生在教育上追求上进和成功，提高了家长和教育期望，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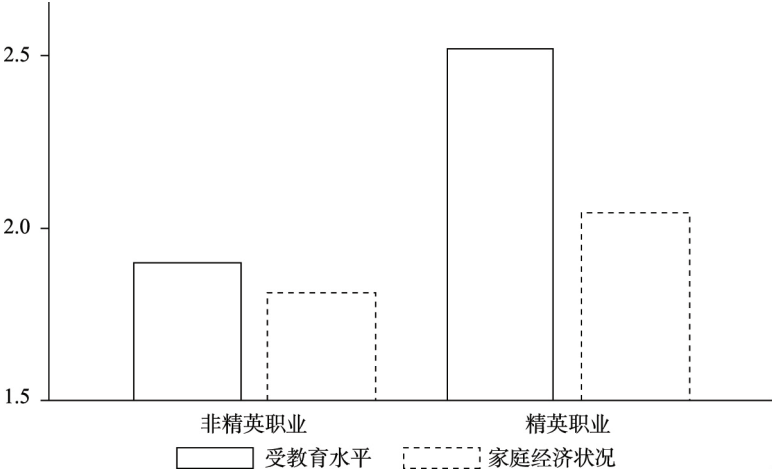


图 1 职业类型与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2013—2014 学年。

⁴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 年数据显示，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均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汇报上个月同周围邻居进行了聊天、看望、提供帮助、一起娱乐/聚餐或者赠送食物/礼物等活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6 年的数据表明 90.23%（87.44%）的农村（城市）居民表示当他们需要邻居帮助时，一定或者可能会有人帮忙；认为邻里关系“好”或者“比较好”的比例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分别为 73.63%和 75.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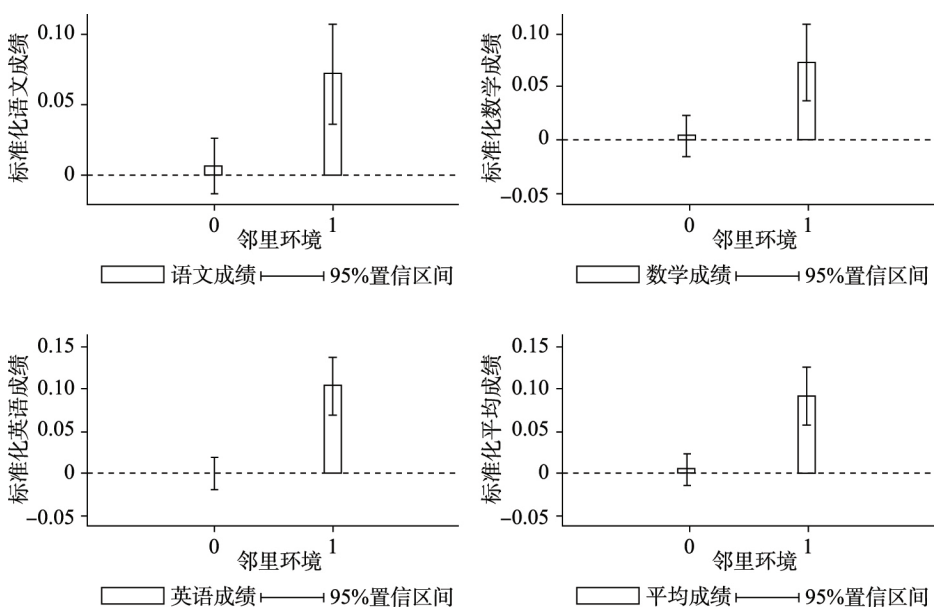


图 2 邻里环境与学生学习成绩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2013—2014 学年。

（二）实证模型

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之下，本文尚未寻找到导致家庭居住地址发生变化且可以获取相关数据的外生冲击事件，现有的研究条件只提供了有限的观测性数据。然而，Clampet-Lundquist and Massey (2008) 指出当利用观测性数据研究邻里环境时，可以通过控制影响个体居住选择的因素来消除自选择和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差。参照他们的做法，为考察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本文使用如下模型进行估计：

$$\text{Stdmean}_i = \alpha \times \text{Neighborhood}_i + \text{Child}_i + \text{Parent}_i + \text{Class}_i + \epsilon_i, \quad (1)$$

其中，Stdmean_{*i*} 是学生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标准化平均成绩；Neighborhood_{*i*} 是代表学生是否处于良好的邻里环境中的虚拟变量；Child_{*i*} 为学生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独生子女状态、迁移流动状态、户口状况和自评健康；Parent_{*i*} 为父母及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父母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家庭自评的经济状况以及居住社区类型，用以控制家庭经济因素和父母特征的影响。Class_{*i*} 为班级层面的固定效应，代表班级规模、学校师资力量等班级和学校层面上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同时，为避免受访者回答偏误，本文剔除了家长问卷中不是由父母作答的样本，最终得到 12 252 名学生样本。表 1 介绍了本文所使用变量的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化平均成绩 (Stdmean)	学生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标准化平均成绩	0.0362	0.966	-5.340	3.010
邻里环境 (Neighborhood)	1=家庭周围主要居住人群的职业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教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0=其他	0.223	0.417	0	1
性别 (Gender)	1=男性；0=女性	0.504	0.500	0	1
年龄（岁） (Age)		13.90	1.331	11	18
独生子女状态 (Only Child)	1=独生子女；0=非独生子女	0.415	0.493	0	1
迁移流动状态 (Migrant)	1=省内/跨省流动；0=本地非流动	0.162	0.368	0	1
户口状况 (Hukou)	1=农业户口；0=非农业户口	0.596	0.491	0	1
自评健康 (Health)	1=很不好；2=不太好；3=一般；4=比较好；5=很好	4.062	0.892	1	5
父亲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_f)	1=没有接受过教育、小学；2=初中、中专/技校、职业高中、普通高中；3=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及以上	1.977	0.539	1	3
母亲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_m)	1=没有接受过教育、小学；2=初中、中专/技校、职业高中、普通高中；3=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及以上	1.858	0.590	1	3
父亲职业类型 (Occupation_f)	1=公务员、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0=其他	0.167	0.373	0	1
母亲职业类型 (Occupation_m)	1=公务员、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0=其他	0.124	0.329	0	1
家庭经济状况 (Economic)	1=困难/比较困难；2=中等；3=富裕/比较富裕	1.827	0.508	1	3
社区类型 (Community_type)	1=街坊型社区；2=单位社区；3=保障性住房社区；4=普通商品房小区；5=高级住宅区；6=城中村；7=农村；8=其他	5.388	2.003	1	8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结果

表 2 汇报了邻里环境和学生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第（1）列的简单线性回归结果说明邻里环境和学生学习成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前一列的基础上，第（2）列进一步控制了学生的个体特征，第（3）列增加了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经济状况和居住社区类型等变量。实证结果显示，邻里环境与学生学习成绩之间始终保持着显著且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基于第（3）列的估计结果，本文认为拥有良好的邻里环境会使得学生的标准化平均成绩提高 0.065 个标准差，大致是户籍因素的 1.3 倍。由于居住隔离导致良好的邻里环境在地理空间上存在异质性分布，邻里环境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更大，会超出本文的估计结果。优势群体及其子代比弱势群体拥有更加良好的邻里环境，能够积累起更多的人力资本，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两者之间的发展差距会被进一步拉大，弱势群体阶层上升渠道日益狭窄，社会流动性将会变差。

表 2 邻里环境与学生学习成绩

	(1)	(2)	(3)
Neighborhood	0.119*** (0.024)	0.095*** (0.024)	0.065** (0.026)
Gender		-0.411*** (0.018)	-0.408*** (0.018)
Age		-0.176*** (0.014)	-0.166*** (0.014)
Only Child		0.055** (0.023)	0.027 (0.023)
Migrant		0.140*** (0.029)	0.157*** (0.029)
Hukou		0.016 (0.023)	0.049** (0.024)
Health=2		0.342*** (0.122)	0.344*** (0.123)

(续表)		
(1)	(2)	(3)
Health=3	0.253** (0.115)	0.261** (0.115)
Health=4	0.380*** (0.114)	0.382*** (0.115)
Health=5	0.299*** (0.114)	0.299*** (0.115)
Education_f=2		0.136*** (0.027)
Education_f=3		0.316*** (0.044)
Education_m=2		0.033 (0.024)
Education_m=3		0.170*** (0.047)
Occupation_f		-0.001 (0.030)
Occupation_m		0.024 (0.035)
Economic=2		0.018 (0.024)
Economic=3		-0.040 (0.045)
Community_type=2		0.023 (0.052)
Community_type=3		-0.076 (0.061)
Community_type=4		-0.012 (0.043)

(续表)			
	(1)	(2)	(3)
Community_type=5			-0.080 (0.079)
Community_type=6			0.004 (0.050)
Community_type=7			0.011 (0.043)
Community_type=8			0.049 (0.096)
常数项	0.009 (0.010)	2.300*** (0.224)	1.953*** (0.230)
班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 平方	0.017	0.083	0.093
观测值	12 252	12 252	12 252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因变量为学生标准化平均成绩。

（二）邻里环境的榜样效应

由于良好的邻里环境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研究其中的传导机制对于制定有效的青少年发展干预政策和公平的教育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良好的邻里环境通常意味着社区主要居住人群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稳定的职业状态，这些精英人群充当了社区内青少年在教育 and 未来生活方面的参照和榜样，激励他们在教育上追求成功、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而且会提高家庭的教育期望（Ainsworth，2002；Wodtke *et al.*，2011）。积极的教育期望不仅会在代际传递价值观和偏好，内化到学生的行为上，形成激励性的心理能量，也会切实影响到父母的教育投入，他们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赵必华，2013）。除此之外，同精英人群的互动也有助于非精英群体获得前者的教育经验和教育理念，对学生的学习表现、人际关系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孙瑜康和袁媛，2014）。

表 3 的前两列结果表明良好的邻里环境显著提高了学生的自我教育期望和

表 3 后两列

通过渠道效应（pathway effect）的方法对传导机制进行了验证。当控制学生/家长的教育期望后，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将不再显著，这意味着教育期望是邻里环境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传导机制。此外，表 4 进一步检验了邻里环境对家长教育参与和学生学习态度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良好的邻里环境会促使家长以更严格的态度关注学生的作业/考试和在学校的表现，监督学生作业并主动与学校老师保持联系沟通，学生的学习态度也发生了改善。

表 3 邻里环境与教育期望

	(1)	(2)	(3)	(4)
Neighborhood	0.061*** (0.019)	0.088*** (0.018)	0.034 (0.024)	0.024 (0.024)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0.485*** (0.011)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0.431*** (0.01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班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平方	0.209	0.168	0.238	0.196
观测值	12 115	12 521	11 800	12 193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包括学生性别、年龄、独生子女状态、迁移流动状态、户口状况、自评健康、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类型、家庭经济状况和居住社区类型。教育期望包括“现在就不念”“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分别取值 1 到 5。前两列因变量为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和家长对学生的教育期望，后两列因变量为学生标准化平均成绩。

表 4 邻里环境与家长教育参与、学生学习态度

	(1)	(2)	(3)	(4)	(5)
Neighborhood	0.041*** (0.014)	0.045*** (0.015)	0.049** (0.024)	0.149*** (0.025)	0.082*** (0.02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班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续表)				
	(1)	(2)	(3)	(4)	(5)
R 平方	0.115	0.100	0.206	0.170	0.158
观测值	12 474	12 354	10 537	12 490	12 53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与表 3 相同。前两列的因变量为家长对学生作业/考试和在校表现的监管程度，分为“不管”“管/但不严”和“管得很严”，分别取值 1 到 3；第（3）列因变量为老师要求家长监督学生作业时，家长的落实情况，包括“基本做不到”“小部分做到”“大部分做到”“全都做到”，分别取值 1 到 4；第（4）列因变量为家长主动联系老师的频率，包括“从来没有”“一次”“二到四次”“五次及以上”，分别取值 1 到 4。最后一列因变量为家长对学生学习态度的评价，包括“很不认真”“不太认真”“一般”“比较认真”“很认真”，分别取值 1 到 5。

除了榜样效应假说，一些学者认为邻里环境影响学生发展的传导机制还包括社区共同监督假说和硬件资源假说。在中国，与其他社区相比，传统街坊型社区内的居民遵循熟人社会的相处模式，相互之间拥有较高的信任水平和频繁的互动活动，对青少年的管控能力较强。基于表 2 第（3）列的回归结果，本文发现街坊型社区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与其他类型社区之间并没有差异，且联合不显著。因此，可以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情境下，尚未发现可以有力支持社区共同监督假说的经验证据。表 5 则对硬件资源假说进行了检验，第（1）至第（5）列分别控制了学生所在社区是否有公共交通、幼儿园、卫生院、公园等硬件资源以及家长对社区内污染状况的评价，代表着社区内硬件资源的可获得性、照料保障、卫生保障、活动空间和污染水平，第（6）列控制了以上全部硬件资源。实证结果表明良好的邻里环境依然对学生学习成绩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对竞争性假说的检验，本文发现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情境之下，榜样效应假说可以较好地解释邻里环境与学生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

表 5 邻里环境、硬件资源与学生学习成绩

	(1)	(2)	(3)	(4)	(5)	(6)
Neighborhood	0.059** (0.026)	0.052* (0.026)	0.051* (0.026)	0.060** (0.027)	0.061** (0.026)	0.046* (0.027)
Community_transportation	0.030 (0.022)					0.033 (0.022)
Community_kidergarten		0.096*** (0.020)				0.070*** (0.021)

	(续表)					
	(1)	(2)	(3)	(4)	(5)	(6)
Community_hospital			0.110*** (0.020)			0.090*** (0.021)
Community_park				-0.006 (0.023)		-0.024 (0.024)
Community_clean					-0.003 (0.019)	0.004 (0.02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班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平方	0.093	0.095	0.095	0.093	0.094	0.097
观测值	10 951	10 951	10 951	10 951	12 000	10 806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与表 3 相同。因变量为学生标准化平均成绩。若家庭所在社区有公共交通、幼儿园、卫生院和公园，则对应虚拟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若家长“比较同意”或者“完全同意”所在社区没有污染，则 Community_clean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三）谁受益更多？

前文对邻里环境与学生学习成绩关系的讨论主要是基于平均意义上的，为进一步加深对邻里环境影响的理解，探究其在不同人群中的异质性及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根据学生性别、年龄、流动状态、户籍状态以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否属于精英群体等标准进行异质性分析，并在不同分组的各个取值处计算了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边际影响。

图 3（a）显示良好的邻里环境对男孩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女孩，这与国外的研究发现不同。国外研究认为男孩更容易接触到不良的社区文化，良好的邻里环境对女孩的正面影响要高于男孩（Chetty *et al.*，2016b）。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望子成龙”的心态，当感受到来自邻里环境的激励时，相较于女儿，有儿子的家庭会受到更大的影响并增加对男孩的人力资本投资。图 3（b）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在不断下降。一方面是由于能力的形成过程具有自我生产（self-productivity）和动态补充（Dynamic Complement）的特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效率不同，早期能力的形成效率要高于后期（Cunha and Heckman，2007）。另一方面，源自学校、班级的同辈效应（peer effect）也会削弱邻里环境的影响（Martens *et al.*，2014）。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和中西部劳动力大规模的向城市和东部地区迁移和流动，传统的社区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重新塑造了中国家庭所处的邻里环境。涌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人群需要面对融入当地社会、完成市民化过程等问题，而流出地则面临着高素质劳动力外流、人口结构中“老弱病残”比重增加的局面。图 3（c）和（d）表明仅有本地非流动和具有非农业户口的学生才会因良好的邻里环境而获得学习成绩的进步，农村户口的学生受到的影响不显著，流动学生甚至会受到消极影响。这说明我国在促进外来家庭融入本地社会、构建和谐友善的邻里环境以及消除城乡发展差距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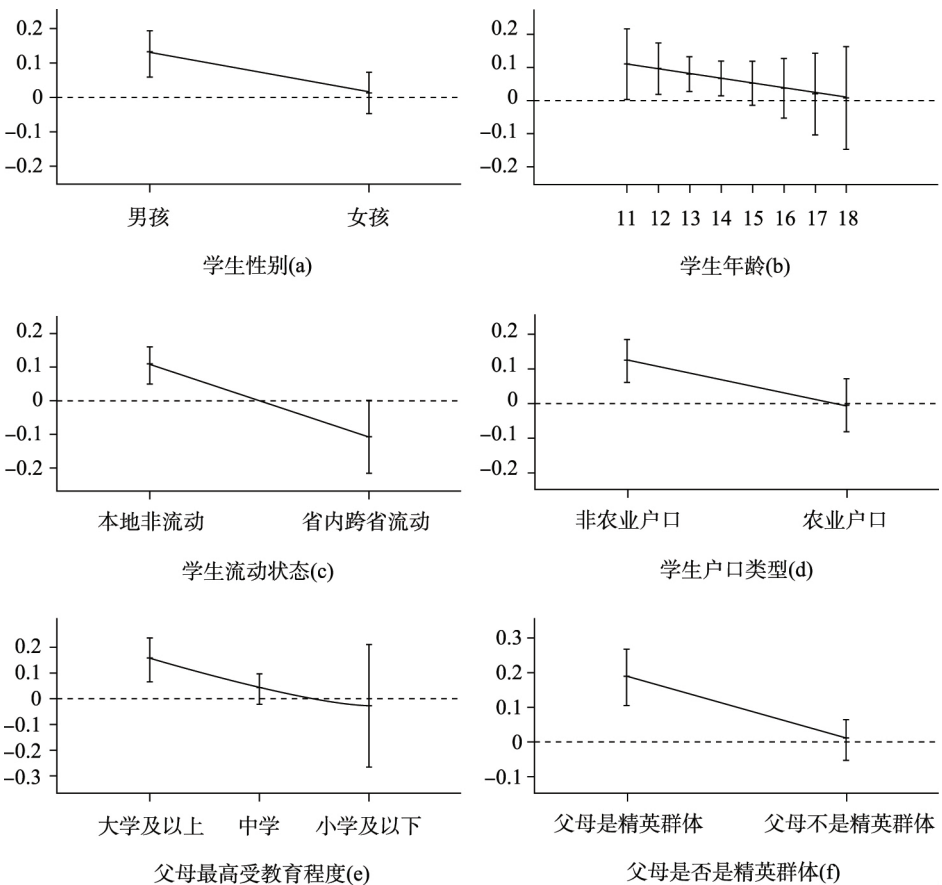


图 3 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图 3（e）和（f）显示良好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高教育和精英家庭，在其他家庭中却不明显。其中原因可能在于，高教育和精英家庭更加了解学校教育的规则和教育的回报，更容易受到邻里环境所产生的榜样效应的影响，从而调整家庭对教育的参与和投入程度，因此促进

了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而其他家庭受到现实环境和自身教育经验的限制，对于良好邻里环境的反应可能并不十分敏感。通过以上四组异质性分析可以发现，弱势家庭可能受到“读书无用论”等消极观念的影响，对教育预期回报持消极看法，良好的邻里环境并没有转化成实际的教育参与和教育投资，不能够帮助学生切实提高学习成绩。优势家庭的学生则充分享受到了良好邻里环境的影响，获得了更好的学习成绩及未来接受优质和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弱势家庭和优势家庭学生之间的教育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不利于实现教育公平和改善社会流动性，也固化了社会阶层和贫困的代际传递。

（四）公共教育资源有用吗？

在消极的邻里环境中，学生缺少值得模仿和学习的榜样人群，面临着诸如“读书无用论”等消极思想和不良行为多发的局面，在正确价值观念的树立和良好行为规范的养成等方面处于不利境地，对其学习表现和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然而，学生的学习表现和未来发展是受到家庭、社区和学校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为了检验公共教育资源对邻里环境与学生学习成绩之间关系的影响，图 4 以学校的生均财政拨款作为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力度的衡量指标。结果显示在公共教育资源丰富的学校，良好的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将变得不再显著。公共教育资源投入的增加可以缩小因邻里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学生在学习成绩上的差异，成为弱势家庭学生改善学习表现和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弥补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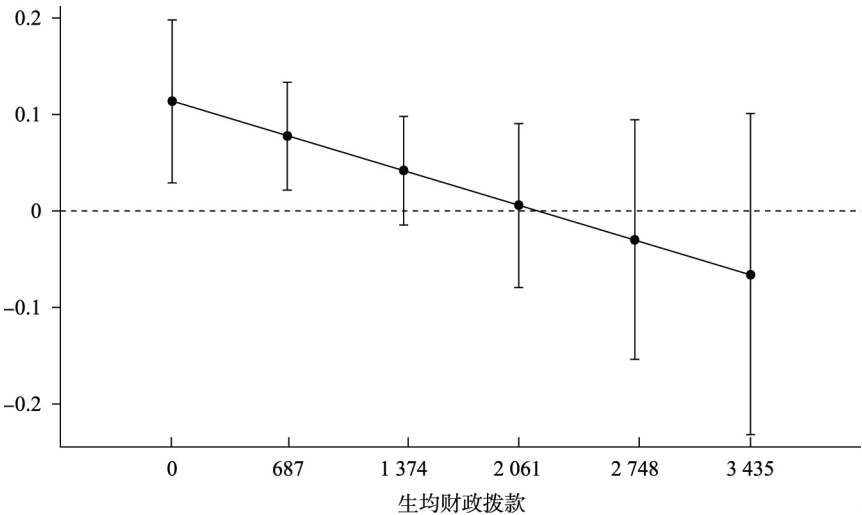


图 4 邻里环境、公共教育资源与学生学习成绩

（五）稳健性检验

由于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就近入学”政策，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需按照户籍所在地到指定的学区接受教育。基于居住地的入学政策和中国社会“望子成龙”的心态客观上造成家庭对优质学校附近住房的强烈需求，引起了教育市场和住房市场之间的互动，即“学区房”现象（冯皓和陆铭，2010）。优势阶层对良好邻里环境的偏好又进一步推高了优质社区的房价，将弱势群体挤向其他区域，在城市空间的塑造上产生了“马太效应”。虽然本文控制了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和居住社区类型等因素，可以比较好地缓解遗漏变量问题，但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实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稳健性检验。

拥有更多社会经济资源意味着家庭能够为子女的健康成长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改善诸如身高、BMI 等生理指标。如果在控制家庭经济状况等变量之后，邻里环境仍然反映了家庭所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源，那么其相应的会对子女的生理指标产生影响。本文利用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每个学生经过性别和年龄调整后的身高和 BMI Z-score。表 6 前两列汇报的是未经调整的身高和 BMI 原始值，后两列是基于 WHO 数据调整的身高和 BMI 的 Z-score。实证结果显示，不论是采用何种生理指标，邻里环境与学生生理指标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这意味着本文所使用的计量模型可以较好地消除来自经济资源方面的遗漏变量问题，增强了将本文结论进行因果解释的可信度。

表 6 邻里环境与学生生理指标

	(1)	(2)	(3)	(4)
Neighborhood	0.140	-0.059	0.013	-0.040
	(0.157)	(0.073)	(0.023)	(0.03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班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平方	0.363	0.111	0.303	0.120
观测值	11 194	9 828	12 248	9 82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与表 3 相同。前两列因变量分别为学生的身高和 BMI，后两列分别为学生的身高 Z-score 和 BMI Z-score。

由于部分家庭可能会寻求将学生安排到配备有优质师资力量的班级，产生事实上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和“分班”问题。为了验证“分班”问题是否会影响邻里环境与学生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表 7 的第（1）列仅保留同时满足学校随机/平均分配新生、学期内未进行过重新分班、没有按照总成绩或者单科成绩进行分班等条件的学生样本，实证结果显示良好邻里环境依然显著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成绩。表 7 的后三列则对“学区房”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第（2）列剔除曾在学生入学阶段购买过学区房的家庭样本，此时良好的邻里环境依然显著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第（3）列发现邻里环境与家庭是否购买学区房的行为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关系，而且相关系数也十分微弱。第（4）列则表明家长对学生的教育期望并不必然引起购买学区房的行为。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学区房”和“分班”问题并不会对本文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

表 7 “分班”与“学区房”问题的检验

	(1)	(2)	(3)	(4)
Neighborhood	0.092*** (0.036)	0.061** (0.027)	0.007 (0.006)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0.001 (0.0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班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平方	0.099	0.096	0.156	0.151
观测值	5 513	11 585	12 468	16 037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与表 3 相同。前两列的因变量为学生标准化平均成绩，后两列因变量为“为了让孩子上这所学校，家庭是否在学校所在片区买房”，有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在表 8 中，本文先后使用学生单科的标准化成绩和班级排名⁵作为学习成绩的衡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不论是采用何种度量方法，良好的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始终保持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本文随机指派家庭所处的邻里环境，模拟并重新估计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重复此过程 10 000 次，绘制其系数分布图，进行安慰剂检验。图 5 的结果显示

⁵ 班级排名的计算依据为学生语文、数学、英语成绩的平均分，并根据 25、50 和 75 分位数划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

随机模拟得出的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大于本文实际估计结果的概率仅为万分之九，属于小概率事件，这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并不是偶然、随机出现的，而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表 8 学生学习成绩的备择衡量方式

	(1)	(2)	(3)	(4)
Neighborhood	0.041*	0.055**	0.075***	0.079***
	(0.025)	(0.027)	(0.025)	(0.02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班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平方	0.124	0.043	0.127	0.084
观测值	12 292	12 286	12 286	12 252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与表 3 相同。因变量分别为学生的语文、数学、英语标准化成绩以及班级排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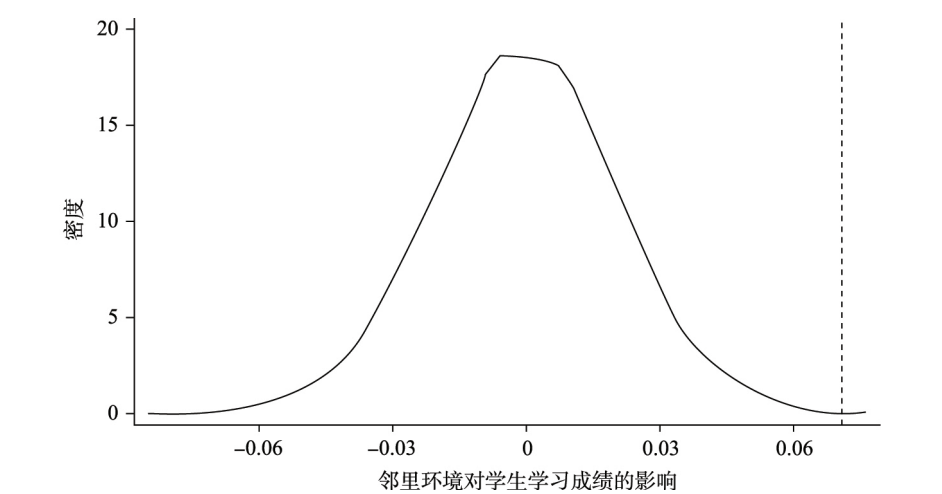


图 5 安慰剂检验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2013—2014 学年。

五、总结与讨论

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来自不同国家的证据显示人们所处的邻里环境对社会流动会产生重要影响，居住在落

后社区的家庭更有可能陷入贫困代际传递的陷阱之中。这一研究结论对于我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劳动力大规模流动迁移,传统的居住格局被打破重组,邻里环境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居住隔离现象随之产生。居住隔离降低了不同阶层间的互动和交往频率,导致良好邻里环境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并通过影响子代行为而造成社会流动性的降低。由于教育不仅关系着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试图从社区居民间非市场互动的角度,研究邻里环境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

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本文发现良好的邻里环境为家庭和学生提供了在学习和行为规范上可以参照和模仿的榜样,激励学生和家长提高教育期望和教育参与程度,从而带来了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实证分析表明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不仅在性别和不同年龄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不公平,具体表现在只有本地非流动、具有非农业户口和来自高教育、精英家庭的学生会受到良好邻里环境的积极影响。值得庆幸的是,公共教育资源投入的增加可以减轻邻里环境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

改善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状况是我国公共政策体系的重要目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进行相关政策设计时,首先要充分考虑到邻里环境的因素,鼓励社会各阶层进行交流和融合。未来的城市发展政策应重视对混合居住进行合理的设计,避免贫困人口聚居带的产生。通过缩短地理空间距离,促进不同阶层间的互动,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社会乘数效应。其次,传导机制分析结果提示公共政策制定者还应重视期望干预政策,提高家长和学生对其教育期望水平,鼓励他们以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教育,树立起“教育有用”和“教育改变命运”的社会风气。有效的期望干预政策不仅执行成本比较低,并且可以通过价值观念的代际传递影响到后代。最后,政府需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教育支出倾斜程度,为他们创造接受更高层次教育和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促使社会公正惠及所有群体。

虽然本文在因果推断的分析框架下对邻里环境设计了较好的识别策略,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也增强了实证分析结论的可信度。然而由于国内相关的外生冲击事件及配套微观数据库的缺乏,导致本文的识别策略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憾。但是,国内的移民搬迁政策提供了潜在的识别机会。受到移民搬迁政策的影响,移民家庭的居住地址发生了变化,邻里环境也随之改变。未来随着微观数据库的不断完善,移民搬迁政策将成为中国邻里环境相关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除了学生的学习成绩,未来的研究还应当关注邻里环境对个

体劳动力市场表现、非认知能力、健康状况、价值观念以及再分配偏好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Ainsworth, J. W., “Why Does It Take a Village? The Mediation of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Social Force*, 2002, 81 (1), 117-152.
- [2] Aizer, A., J. Currie, P. Simon, and P. Vivier, “Do Low Levels of Blood Lead Reduce Children’s Future Test Scor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8, 10 (1), 307-341.
- [3] Bell, A. M., R. Chetty, X. Jaravel, N. Petkova, and J. Van Reenen, “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062, 2017.
- [4] Borjas, G. J., “To Ghetto or Not to Ghetto: Ethnicity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8, 44 (2), 228-253.
- [5] Browning, C. R., L. A. Burrington, T. Leventhal, and J. Brooks-Gunn, “Neighborhood Structural Inequality,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Sexual Risk Behavior among Urban Youth”,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008, 49 (3), 269-285.
- [6] Chay, K. Y., and M. Greenstone, “The Impact of Air Pollution on Infant Mortality: Evidence from Geographic Variation in Pollution Shocks Induced by a Recess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 (118), 1121-1167.
- [7] Chetty, R., and N. Hendren,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 Childhood Exposure Effec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8a, 133 (3), 1107-1162.
- [8] Chetty, R., and N. Hendren,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i: County-Level Estim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8b, 133 (3), 1163-1228.
- [9] Chetty, R., N. Hendren, and L. F. Katz,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 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a, 106 (4), 855-902.
- [10] Chetty, R., N. Hendren, F. Lin, J. Majerovitz, and B. Scuderi, “Childhood Environment and Gender Gaps in Adulthoo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b, 106 (5), 282-288.
- [11] 陈钊、陆铭、陈静敏, “户籍与居住区分割: 城市公共管理的新挑战”,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5期, 第77—86页。
- [12] Christian, H., S. R. Zubrick, S. Foster, B. Giles-Corti, F. Bull, L. Wood, M. Knuiman, S. Brinkman, S. Houghton, and B. Boruff, “The Influence of the Neighborhood Physical Environment on Early Child Health and Development: A Review and Call for Research”, *Health & Place*, 2015, 33, 25-36.
- [13] Clampet-Lundquist, S., and D. S. Massey,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Economic Self-Sufficiency: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8, 114 (1), 107-143.
- [14] Cutler, D. M., and E. L. Glaeser, “Are Ghettos Good or Ba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

- ics, 1997, 112 (3), 827-872.
- [15] Cunha, F., and J. J. Heckman, "The Technology of Skill 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 (2), 31-47.
- [16] 冯皓、陆铭, "通过买房而择校: 教育影响房价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含义", 《世界经济》, 2010 年第 12 期, 第 89—104 页。
- [17] Galster, G. C., and A. M. Santiago, "What's the 'Hood Got to Do with It? Parental Perceptions about How Neighborhood Mechanisms Affect Their Children",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0, 28 (3), 201-226.
- [18] Ginther, D., R. Haveman, and B. Wolfe, "Neighborhood Attributes as Determinants of Children's Outcomes: How Robust Are th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0, 603-642.
- [19] Guerra, N. G., L. R. Huesmann, and A. Spindler, "Community Violence Exposure, Social Cognition, and Aggression among Urba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2003, 74 (5), 1561-1576.
- [20] Harding, D. J.,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Violence in Disadvantaged Neighborhoods", *Social Forces*, 2009, 88 (2), 757-784.
- [21] Heckman, J. J., "The Economics of Inequality: The Valu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merican Educator*, 2011, 35 (1), 31-35.
- [22] 李磊、胡博、郑妍妍, "肥胖会传染吗?", 《经济学》(季刊), 2016 年第 15 卷第 2 期, 第 429—452 页。
- [23] 陆铭、张爽, "'人以群分': 非市场互动和群分效应的文献评论", 《经济学》(季刊), 2007 年第 6 卷第 3 期, 第 991—1020 页。
- [24] Martens, P. J., D. G. Chateau, E. M. Burland, G. S. Finlayson, M. J. Simth, C. R. Tayloy, M. D. Brownell, N. C. Nickel, A. Katz, J. M. Bolton, and PATHS Equity Team, "The Effect of Neighborhoo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Outcomes for Children Living in Social Hous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4, 104 (11), 2103-2113.
- [25] Monkkonen, P., A. Comandon, and J. Zhu, "Economic Segregation in Transitio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20 Largest Cities", *Urban Geography*, 2017, 38 (7), 1039-1061.
- [26] Nicodemo, C., and G. A. García, "Job Search Channels, Neighborhood Effects, and Wages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olombian Case",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2015, 53 (2), 75-99.
- [27] Oberwittler, D., "The Effects of Neighbourhood Poverty 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urs: A Multi-Level Analysis Differentiated by Gender and Ethnicity", *Housing Studies*, 2007, 22 (5), 781-803.
- [28] Pool, V. K., N. Stoffman, and S. E. Yonker, "The People in Your Neighborhood: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Mutual Fund Portfolios", *Journal of Finance*, 2015, 70 (6), 2679-2732.
- [29] Rickford, J. R., G. J. Duncan, L. A. Gennetian, R. Y. Gou, R. Greene, L. F. Katz, R. C. Kessler, J. R. Kling, L. Sanbonmatsu, A. E. Sanchez-Ordóñez, M. Sciandra, E. Thomas, and J. Ludwig,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Use of African-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5, 112 (38), 11817-11822.
- [30] Rosenfeld, L., R. Rudd, G. L. Chew, K. Emmons, and D. Acevedo-Garcia, "Are Neighborhood-

- Leve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Indoor Allergens in the Household?”, *Journal of Asthma*, 2010, 47 (1), 66-75.
- [31] 孙瑜康、袁媛,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背景下青少年成长的邻里影响——以广州市鹭江村与逸景翠园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年第 6 期, 第 756—764 页。
- [32] Sciandra, M., L. Sanbonmatsu, G. J. Duncan, L. A. Gennetian, L. F. Katz, R. C. Kessler, J. R. Kling, and J. Ludwig,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Residential Mobility Experiment on Crime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2013, 9 (4), 451-489.
- [33] Wilson, J. Q., and G. L. Kelling, “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Broken Windows”, *Atlantic Monthly*, 1982, 127 (2), 29-38.
- [34] Wilson, W. J.,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35] Wilson, W. J.,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Vintage, 1996.
- [36] Wodtke, G. T., D. J. Harding, and F. Elwert, “Neighborhood Effects in Temporal Perspective: The Impact of Long-Term Exposure to Concentrated Disadvantage on High School Gradu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1, 76 (5), 713-736.
- [37] 吴愈晓、黄超, “基础教育中的学校阶层分割与学生教育期望”, 《中国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4 期, 第 111—134 页。
- [38] 晏艳阳、邓嘉宜、文丹艳, “邻里效应对家庭社会捐赠活动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的证据”, 《经济动态》, 2017 年第 2 期, 第 76—87 页。
- [39] 赵必华, “影响子女学业成绩的家庭与学校因素分析”, 《教育研究》, 2013 年第 3 期, 第 88—97 页。
- [40] 郑磊, “教育中的社区效应和同伴效应: 方法、证据及政策启示”, 《教育学报》, 2015 年第 5 期, 第 99—110 页。

You Can't Be What You Can't See: The Effect of Neighborhood on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JUNPENG WANG YUANPING LU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KEZHONG ZHA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Based on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eighborhood on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the background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children grown up in an advantaged neighborhood will perform better in the academic examination. This positive effect comes from the role models living in the neighborhood, they have enhanced both student's and parent's expectation of student's education. Students in advantaged families benefit more from the advantaged neighborhood. However, the public educational investment can mitigate the education inequality caused by neighborhood. Our results provide suggestive evidence for related intervention policies.

Key Word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neighborhood effect, academic achievement

JEL Classification I21, J13, J62

* Corresponding Author: Kezhong Zhang, Room 560, School of Manage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Tel: 86-13971208257; E-mail: zkzdr@hust.edu.cn.